



JCLE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JCLEE, Vol. 1, No. 2, 2025, pp.218-229.

Print ISSN: 3078-283X; Online ISSN: 3104-5030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cle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2.04>



认同与变迁：泰北云南籍华人新生代华语传承的混合研究

刘娟娟（Liu Juanjuan），王晋军（Wang Jinjun）

摘要：泰国北部作为连接中、泰、老、缅的地缘枢纽，既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南向通道的战略节点，也是跨境民族研究的关键区域。本文聚焦移居该区域的云南籍华人社群，采用一致性并行式混合研究方法（通过量化与质性数据的系统性整合），系统考察其语言文字实践的表征形态及其社会文化建构逻辑，揭示华语传承的现实样态与深层动因。研究发现，受跨境语言生态、人口结构变迁及社会互动模式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北云南籍华人的语言实践已从单一汉语汉字格局，演变为多语多文交互渗透的杂糅形态。尤其自第四代移民起，其语言选择呈现明显的泰语转用倾向，但对祖籍国语言文字的文化认同仍保持较高水平，构成华语传承的核心情感基础。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建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遵循，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充分尊重在地语言生态的前提下，通过激活中华文化基因的当代传播活力，依托在地化传播载体与受众偏好，构建华语及中华文化可持续传承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泰北云南籍华人新生代；华语传承；混合研究

作者简介：刘娟娟，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及东南亚华人研究。电邮：liujuanjuan@ynnu.edu.cn。王晋军（通讯作者），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电邮：jjwangkm@126.com。

Title: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 A Mixed-Methods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New-Generation Thai-Chinese of Yunnanese Descent in Northern Thailand

Abstract: Northern Thailand, as a geopolitical nexus connecting China, Thailand, Laos, and

Myanmar, serves as both a strategic node along the southern corridor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a critical region for cross-border ethnic stud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Yunnanese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y settled in this region. Employing a convergent parallel mixed-methods design (characterized by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ir language and script practices and the underlying sociocultural construction logic, thereby revealing the contemporary realities and deep-seated drivers of Chinese language heritage transmiss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the cross-border linguistic ecology, demographic shift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the linguistic practices of Yunnanese Chinese in Northern Thailand have evolved from a monolingual/monographic paradigm centered on Chinese into a hybridized configur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mutual permeation of multiple languages and scripts. Notably, beginning with the fourth-generation immigrants, a marked shift towards Thai language adoption is evident. However, a robust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language and script of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persists, forming the core affective foundation for Chinese language heritage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 should be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co-creation, co-development, and mutual benefit, and while fully respecting the local linguistic ecology, it recommends activating the contemporary vitality of Chinese cultural DNA transmission. This entails leveraging localize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audience preferences to construct sustainable pathway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words: New-generation Yunnanese Thai-Chinese; Heritage Chinese transmission; Mixed methods study

Author Biography: **Liu Juanjuan**, Lecturer at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Supervisor. Research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ies. E-mail: liujuanjuan@ynnu.edu.cn. **Wang Jinjun**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University, Doctoral Supervisor. Research Interests: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E-mail: jjwangkm@126.com.

一、引言

海外华侨华人作为跨文明对话进程中的核心主体，依托其独特的语言文化资源禀赋，在推动中外互信机制建构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本研究聚焦泰国北部——中国“一带一路”南向通道核心节点，以二十世纪中叶迁入泰北的“云南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鉴于当前学界缺乏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解析泰北“云南人”的语言实践如何表征并建构华语传承，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以及混合研究方法，拟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厘清该群体的语言传承现状及影响因素；第二，提出文化传承实

践路径；第三，依托在地化传播机制激活中华文化基因，为“一带一路”人文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范式。

1977年，加拿大“安大略祖传语项目”首次出现“heritage language”一词。20世纪90年代后，该术语在北美语言教育领域流行，Silvina Montrul、Amalia Llombart-Huesca、Maria Polinsky、Guadalupe Valdés等学者成果丰硕，其中Montrul(2015)的专著*The Acquisition of Heritage Languages*有较大影响。Llombart-Huesca(2017)探讨了服务学习项目对西班牙语遗产语言学习者批判性语言意识发展的意义；Polinsky(1995)聚焦遗产语言的习得与流失问题；Valdes(2005)在其高引文章中指出，遗产语言学习者在家庭语域中能接触并掌握非英语语言，但在正式教育语域中能力不足，且语言能力随着语域而变化。国外“heritage language”研究主要集中于四方面：Valdes(2005)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与遗产语言学习者差异的探讨；Montrul(2006)对遗产语言者语言特征及习得差异的研究；Leeman(2015)等对传承语习得者身份认同的研究；Xiang(2016)的传承语教学研究；Beaudrie & Fairclough(2012)等的传承语语种研究。研究方法上，质性与实证研究并存，但整合定量与定性数据的混合研究并不多见。此外，国外学者围绕语言认同、影响因素等展开海外华语传承研究（Mu, 2016; Zhang, 2010; Xie, 2014; Curdt-Christiansen, 2009; Li, 2020），但针对区域生态特征的混合研究仍比较少见。

“heritage language”的译法多样，“华语/祖语传承”的译法多用于海外华人语言传承研究。国内的研究起步晚于国外，与濒危语言研究同步，主要集中在李宇明(2003)的汉语及方言传承，戴庆厦(2017)的少数民族语言传承、郭熙(2015)和周明朗(2014)的华语传承三大领域，鲜少介绍国外华语传承的混合研究。近年国内华语传承研究发展迅速，郭熙(2017)首次系统阐述华语传承，介绍其类型与功能，目前已构建了理论框架，传承语界定、身份认同等成为研究热点。郭熙(2021、2020、2013)系统探讨祖语的概念及海外传承现状与挑战；王爱平(2006)探讨了汉语使用与华人身份认同；曹贤文(2014、2018)以继承语理论审视海外华文教学。现有成果论文居多，著作较少。张金桥(2021)的著作从多维度视角深入探讨了华语传承、认同及测试。总体而言，海外华语传承研究得到多学科领域的关注，研究范围逐步扩大，但在调查、影响因素、家庭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不足，基于田野调查的混合研究尤为少见。鉴此，本研究立足泰北的语言生态，对泰北云南籍华人的华语传承展开混合研究，聚焦三个问题：一，泰北“云南人”新生代语言文字使用反映的华语传承现状；二，其华语传承的影响因素；三，祖籍国助推华语及中华文化传播的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泰北华人村的四代云南籍华人为研究对象。这一群体多为半个世纪前从中国云南迁徙至泰国北部的华人后裔，其身份构成呈现多样性——既包括中国籍侨胞、泰国籍华人，也涵盖部分无合法身份的华人。通过方便抽样收集的问卷数据显示：研究对象中女性占比更高（男性190人、女性282人）；年龄跨度较大（16至90岁），但以17岁左右的新生代为主；职业分布则集中在“科研与教育”“农、林、渔、牧业”等领域。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一致性并行式混合研究方法”为核心方法论框架，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其一，通过定量研究勾勒整体图景：首先系统描述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现状，进而将语言使用变量与人口统计变量建立关联——采用“交叉表（Cross - table）”分析名义变量间的使用频率分布，再通过“卡方检验”验证语言使用与性别、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等变量的相关性。此环节借助“专家评审”与“问卷测试数据分析”双重手段，确保调查结果的科学性与可信度，旨在揭示华语在多元语言环境中的传承现状及影响因素。

其二，基于扎根理论开展定性研究：对田野调查获取的录音/录像、图片、文本等原始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关联与批注，过程中贯穿“去繁入简、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逻辑，并通过“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保障研究的严谨性。

其三，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发现：运用“并列比较表”系统梳理两类研究的结果，结合生态语言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视角阐释其异同与内在关联，最终形成兼具实证支撑与理论深度的研究结论。

（三）数据采集及统计

定量数据经 Epidata 17.0 整理后，采用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具体运用描述性统计与推断性统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定量研究。其中，调查问卷所采用的 Likert 五级量表信效度表现良好，信度 Cronbach's α 值达 0.781，效度 KMO 值为 0.60。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487 份，经筛选获得有效问卷 472 份，问卷回收率为 97%，有效率为 94%。对于访谈资料、图片、视频等定性数据，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依托 Nvivo12.0 对音频、视频、图片及文本的编辑功能，进行系统化编码与统计分析。在完成定量与定性数据的统计分析后，通过“一致性并行式混合研究方法”对两类数据的研究发现进行有机整合，最终形成本研究的结论。

三、泰北云南籍华人新生代的华语传承现状

华语的传承与语言使用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其中语言使用是语言传承的基础，它表征并建构语言传承。海外华人在家庭、社区和交际等多个语域中的汉语使用就是华语传承的表征，也是建构华语传承的基础。只有海外华人在实际生活中使用华语，华语才能得以良好地传承。因此，考察海外华人的语言使用能有效反映他们传承华语的现状。

（一）泰北云南籍华人新生代多场域华语传承现状的定量分析

1. 多场域华语传承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家庭语域中，云南方言是泰北“云南人”最主要的交际语言与传承载体。数据显示（ $n=472$ ，取值范围 0-1），受试者与祖父辈、祖母辈、父亲辈、母亲辈及兄弟姐妹交流时，云南方言的使用均值依次为 0.79、0.78、0.78、0.77、0.71，均显著高于汉语普通话、泰语等其他语言，且接近最大值 1，表明其在家庭内部的强势地位。不过，在与祖母或母亲等女性长辈交际时，偶尔会穿插少量泰语；而与祖父辈交流时，则几乎完全使用云南方言，未出现泰语混用现象。

受语言生态环境影响，社会生活语域的语言使用呈现复杂态势，也使得华语传承表现出明显的杂糅性特征。在官方正式场合，受泰国政府语言政策制约，泰语成为主导性语言——数据显示，受试者在泰国政府部门、医院等场景中，标准泰语及泰语方言的使用均值分别达 0.83 和 0.82，接近最大值 1，表明无论主动或被动，他们均严格遵循当地语言政策，优先使用泰语而非华语。但在集市、

路边餐馆、社区街区等非官方公共场合，语言选择呈现族群倾向性，与街坊邻里、亲友交流时会自然选用云南方言。

尽管居住于泰国偏远山区，泰北“云南人”原有的单一生活模式已受到信息化时代多元媒体的冲击，这一变化对其华语传承（尤其是新生代群体）产生了显著影响。受泰国主流媒体渗透，泰语在信息获取场景中的使用频率持续攀升：通过泰国电视、报纸杂志、广播获取信息时，泰语使用均值分别达 0.69、0.68、0.67，均接近最大值 1，显示出媒体环境对语言选择的深刻影响。

2. 多语域华文传承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除语言生态因素外，人口统计学特征同样影响着泰北“云南人”新生代的华语传承。为探究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华语传承所呈现的语言使用表征及建构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通过“卡方检验”分析了语言使用与性别、年龄、华人代际、职业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关联，具体结果如下：

(1) 与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数据显示，仅在家庭语域中与祖父辈交际时，受试者的语言使用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chi^2=20.238$, $df=3$, $p=0.000^*<0.001$ ）。这表明，在家庭语域中，性别可对受试者使用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的情况起到预测作用，但在其他语域中则不具备预测力。

(2) 与年龄的相关性分析

数据显示，在家庭语域中，受试者与祖母辈（ $\chi^2=21.557$, $df=9$, $p=0.010^*<0.05$ ）、父亲辈（ $\chi^2=26.455$, $df=9$, $p=0.002^*<0.05$ ）、母亲辈（ $\chi^2=26.274$, $df=9$, $p=0.002^*<0.05$ ）、兄弟姐妹（ $\chi^2=500.359$, $df=9$, $p=0.000^{**}<0.001$ ）及配偶（ $\chi^2=27.276$, $df=9$, $p=0.001^*<0.05$ ）交际时，受试者在汉语普通话、云南方言等语言的使用上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的年龄差异，说明年龄可预测家庭语域的语言使用情况。在社会生活语域，与邻里（ $\chi^2=18.377$, $df=9$, $p=0.031^*<0.05$ ）、集市（ $\chi^2=25.241$, $df=9$, $p=0.003^*<0.05$ ）、医院（ $\chi^2=22.317$, $df=9$, $p=0.008^*<0.05$ ）、工作单位/学校（ $\chi^2=23.759$, $df=9$, $p=0.005^*<0.05$ ）交际时，受试者的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使用因年龄不同而存在差异，且在当地餐馆（ $\chi^2=37.883$, $df=9$, $p=0.000^{**}<0.001$ ）和街道（ $\chi^2=43.635$, $df=9$, $p=0.000^{**}<0.001$ ）场景中，这种差异更为明显。在信息咨询领域，受试者在阅读报刊杂志（ $\chi^2=22.455$, $df=9$, $p=0.007^*<0.05$ ）、观看电视节目（ $\chi^2=28.269$, $df=9$, $p=0.001^*<0.05$ ）、观看电影（ $\chi^2=22.068$, $df=9$, $p=0.009^*<0.05$ ）、收听广播（ $\chi^2=20.138$, $df=9$, $p=0.017^*<0.05$ ）时的语言使用受年龄影响，尤其在网络场景中（ $\chi^2=49.971$, $df=9$, $p=0.000^{**}<0.001$ ），年龄对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使用的影响更为突出。可见，在多场域下，年龄在多个维度上均可预测其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的使用情况。

(3) 与华人代际的相关性分析

数据显示，在家庭场域华人代际仅能预测受试者与父亲辈（ $\chi^2=15.057$, $df=9$, $p=0.020^*<0.05$ ）、母亲辈（ $\chi^2=19.184$, $df=9$, $p=0.004^*<0.05$ ）交际时的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使用情况。在社会生活语域，华人代际对受试者在工作单位/学校（ $\chi^2=23.33$, $df=9$, $p=0.005^*<0.05$ ）、本地餐馆（ $\chi^2=21.628$, $df=9$, $p=0.010^*<0.05$ ）中的语言使用有预测作用，在街道场景中（ $\chi^2=23.519$, $df=9$, $p=0.000^{**}<0.05$ ），这种预测作用尤为明显，即华人代际会显著影响受试者在工作单位/学校、本地餐馆、街道等语域的语言使用。在信息咨询语域中，受试者的华人代际可预测受试者在报纸杂志（ $\chi^2=13.446$, $df=9$, $p=0.036^*<0.05$ ）、电视节目（ $\chi^2=18.254$, $df=9$, $p=0.006^*<0.05$ ）、电影（ $\chi^2=21.448$, $df=9$, $p=0.002^*<0.05$ ）维度的语言使用，在网络维度（ $\chi^2=33.159$, $df=9$,

$p=0.000^{**}<0.001$)上,这种预测作用更为显著。可见,在多场域下,华人代际在多个维度上均可预测其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的使用情况。

(4) 与职业的相关性分析

数据显示,仅在社会生活场域的工作单位/学校场景中,受试者的职业对其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等语言使用有预测作用;在家庭、信息咨询等其他语域中,职业无法预测其语言使用情况。

综上所述,在家庭、社会生活和信息咨询语域中,性别、年龄、华人代际和职业在多个维度上对受试者的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等语言使用具有预测作用或显著预测作用。这表明,汉语(包括普通话和云南方言)仍是泰北“云南人”新生代在多语域中使用最频繁的语言,而泰语传承则处于次要地位,其他语言虽有少量使用,但未形成传承态势。

(二) 泰北云南籍华人新生代多语域华语传承现状的定性分析

本部分采用 Nvivo12.0 软件对采集到的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等质性数据进行分析,聚焦受试者的华语传承状况开展“解释—描述性”研究。数据分析阶段,采用“自上而下”的模版式编码方法进行系统统计:鉴于 Nvivo12.0 具备直接处理多元数据的功能,研究未对音频/视频资料进行文本转写,而是直接利用软件进行编码分析。结果显示,在语言文字符号使用维度下,共析出节点数据来源 122 个,参考点 339 个(详见表 1)。

表 1 数据显示,语言使用维度的节点数据来源数为 14 个、参考点数为 91 个,文字使用维度的节点数据来源数为 108 个、参考点数为 248 个。在本研究的编码体系中,“节点数据来源数”与“参考点数”的数值越高,表明该节点所反映的信息在华语传承中的重要性越强、出现频率越高,且受试者的认同度也越高。

结合表 1 中三级编码节点及参考点的典型案例可见,受试者的语言使用与文字使用均呈现显著的杂糅性特征:在语言层面,除传承汉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外,泰语、少数民族语言、缅甸语等也被纳入其使用与传承体系;在文字层面,除汉字符号外,泰文字母与英语文字同样被广泛使用并形成传承态势。

树桩节点和子节点	节点数 据来源数	参考 点数	参考点典型示例
汉语普通话	4	33	打临时黑工时,会使用汉语普通话 与我的大儿子交谈时用汉语普通话
标注泰语	3	33	偶尔会讲泰语 孩子之间时不时地会使用泰语
语言使用 云南方言	3	16	跟缅甸来的果敢族传教士,我也会大量使用云南话 使用最多的还是云南话
华文传承表现 少数民族语言	1	4	以前我还会讲佤语,现在不太讲了 在泰北讲汉语、泰语和傣语
缅甸语	2	4	布道时有缅甸语翻译 与妻子讲缅甸语和缅甸普通话
越南语	1	1	我第 11 个儿子在台湾省读书时找了个开餐馆的越南人,所以他还会讲越南语
中文简体字	18	40	座右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祝福语: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中文繁体字	49	140	菜单名:凉拌向日葵豆芽

文				中文繁体字通知：2018年7月28日因泰皇生日放假一天
字				泰文的茶叶广告
使	泰国文字	32	57	路标上的泰文路名
用	英语文字	9	11	我大儿子可以流利地说泰语、汉语普通话和英语
				华校校长名片上的英文联系方法

表 1. 定性数据编码节点层次及数据信息（单位：个）

Table 1: Hierarchy of Qualitative Data Coding Nodes and Data Information (Unit: Count)

综上可知，尽管汉语汉字仍是泰北“云南人”传承的核心语言文字，但受当地语言生态影响，其语言文字传承已呈现多语种、多文字并存的格局。其中，泰北独特的语言生态（尤其是泰国政府的语言政策）对受试者的语言文字使用及传承方向影响显著：老一辈华人多因语言政策压力在官方公共场合使用泰语，私下仍偏好使用族群熟悉的华语；而新生代对泰语的使用则更多出于自主选择，例如在非官方公共场合逐渐习惯与同伴大量使用泰语，这一趋势已对华语在新生代中的传承构成潜在影响。这种“华语与泰语并存传承”的模式，是他们适应泰北语言生态的客观选择，但目前已逐步显现出泰化的倾向。

（三）泰北云南籍新生代华语传承的定量定性混合分析

在前文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利用“定量定性分析发现并列比较表”（如表 2 所示）有机整合前文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的异同与联系，从而形成本研究的最终研究结论。

如表 2 所示，定量与定性分析均揭示了语言使用维度在表征并建构泰北“云南人”华语传承中的作用。定性分析进一步识别出另一个关键维度：文字使用。研究发现，研究对象普遍沿用其祖辈从中国移居泰国时携带的汉语繁体字。然而，伴随近年来泰国兴起的汉语学习热潮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汉语简体字在泰北“云南人”社群，尤其是接受过系统华文教育的新生代群体中，逐渐普及。由此可见，研究对象的语言与文字实践，共同表征并动态建构其独特的华语传承。这些从中国云南迁居泰北的社群，在泰国这一新的语言生态中，积极维系着华人族群的语言文化符号。同时，为适应新环境，他们与泰国社会的主流语言（泰语）及文字，以及泰北地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字系统，展开了持续的语言接触、互动与融合。这种多语多文的接触与交融，清晰地体现在其语言和文字使用的多个层面。此外，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等）被发现与当地语言生态的多重影响因素（如社会网络、教育政策、经济联系等）存在显著的共变关系。基于上述发现，下文将对泰北“云南人”华语传承的现状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总结性概述。

	语言使用的语域	语言使用的频率	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别	语言使用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文字使用的差异
家庭语域	首选云南方言，与祖母、母亲辈女性交流时会适当用泰语，与祖父辈不用泰语。	汉语（包括普通话和云南方言）仍是泰北“云南人”新生代	在多语域的多维度中，华年代际都可预测其汉语普通话	家庭语域与祖父辈交际存在性别语言使用差异。三个语域均存在	/

定量分析发现	官方公共场合首选标准泰语，民间非正式场合多用云南方言或汉语普通话。	在多语域中使用最频繁的语言	和汉语方言的使用情况	年龄、代际导致的语言使用差异，且较明显。社会生活语域中工作单位/学校存在因职业不同的语言使用差异。	/
定性分析发现	公共性强的非官方语域多用汉语普通话；私人性质强的非官方场合，多用云南方言。	泰北华人村内，汉语汉字使用最多，泰语泰文次之，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缅甸文最少。	华一代、华二代多使用汉语汉字；华三代、华四代既用汉语汉字，也用泰语泰文，且有泰化趋势。		中文繁体字较常用，但随着中国发展，上过华校的华三代、华四代越来越多使用中文简体字。
	官方性质强的正式公共语域	按使用顺序为泰语泰文、英语英文、汉语汉字。	/	/	/

表 2. 定量定性分析发现并列比较表

Table 2: Parallel Comparison Table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Findings

四、泰北“云南人”新生代华语传承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

受泰北特定语言生态及当地“云南人”群体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其新生代的华语传承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并受多重因素制约。具体分析如下：

（一）华语（汉语）的核心地位与泰语的显著影响

汉语，尤其是云南方言，仍是泰北“云南人”新生代语言传承的核心，但泰语的使用频率与影响力正在显著提升。当前，新生代日常使用并传承的主要语言为汉语普通话和云南方言。然而，受泰国国家语言政策的强力驱动，标准泰语及泰北方言的使用范围正快速扩大。语言使用现状表明，尽管新生代同时传承汉语与泰语，但两者在传承体系中的地位与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华语传承仍占据相对主导地位。这一现象既是泰北多元语言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也深刻反映了华人族群的集体情感认同与心理维系。为适应当地语言生态，新生代在官方正式场合普遍使用泰语；而在非官方领域，则倾向于选择其更为熟悉的汉语。这种选择呈现场合化特征：在华人学校、商业场所等非官方公共空间多使用汉语普通话，而在家庭等私人领域则偏好云南方言。信息获取行为亦遵循此模式：接触泰国主流媒体时使用泰语，私人休闲娱乐时则倾向选择汉语资源。

（二）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局限性与内部化

苗语、阿卡语等与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同源的泰北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其使用和传承主要局限于本民族内部，并未在泰北“云南人”新生代中得到广泛传承。新生代群体普遍未形成规模化使用和传承这些语言的态势，主要是此类语言在泰北华人社区的使用频率和覆盖面均较低，未能建立有效的代际传承机制。泰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源自中国云南人的迁徙，但由于当地社会经济相对滞后、文化科技影响力有限，绝大多数“云南人”（尤其是新生代）缺乏主动学习和传承这些语言的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向城镇迁移就业，泰北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数量近年有所增加，但远未达到形成稳定传承的规模。因此，这些同源少数民族语言目前仍主要作为族内交流工具在其本民族社群中使用和延续。

（三）汉字传承的韧性、制约与人口学变量影响

汉字作为承载中华文化的主要文字系统，仍是泰北“云南人”新生代传承的主流文字。然而，其传承过程受到泰北语言生态的显著制约，部分人口统计学特征亦产生影响。迫于泰国政府推行的语言政策等的压力，新生代在官方领域必须使用并传承泰文。与此同时，强烈的族群认同驱动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习惯使用并致力于传承汉字，视其为华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由于汉字传承与泰国官方文字政策（高度推崇西方语言文字）存在张力，其使用被限制在非官方场合。这导致了在华人聚居区，官方公共空间中汉字地位低于泰文和英文的特殊现象。尽管如此，泰北“云南人”对自身族群文字符号保持着高度认同，在重重制约下仍坚持传承汉字。除语言生态外，调查显示，年龄与华人代际（移民世代）是影响语言传承的关键人口学变量，而性别、职业和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综上所述，泰北“云南人”新生代的华语传承当前呈现出显著的杂糅性特征，并显现出向泰语靠拢的一体化发展趋势。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普遍使用汉语较多且传承意识较强。泰国本土出生的第三代、第四代新生代则多为汉语与泰语的双语使用者及传承者，单一使用或仅传承泰语的情况较为罕见。此现象成因复杂，是泰北独特语言生态与“云南人”群体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代际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四代“云南人”的语言传承格局正经历转变：祖辈影响使新生代在语言生态中延续着汉语传承，但为适应泰国社会，他们已广泛采纳并传承泰国主流语言文字——泰语及泰文。这表明，原云南移民相对单一的语言文字格局已被泰北多语多文的环境打破。泰国官方语文（泰语/文）、当地少数民族语文、国际通用语（如英语）及邻国语文（如缅语）均与汉语/汉字发生着持续的接触、碰撞与融合。然而，随着老一辈移民的逝去及本土出生新生代比例的持续增长，泰语泰文的使用与传承日益普遍，当地语言传承格局正显现出清晰的“泰化”趋势。

五、促进泰北“云南人”新生代传承华语的路径

泰北“云南人”群体在异国环境中持续传承汉语汉字及中华文化。由于地处泰国偏远山区，受泰国主流语言文字影响较弱，该区域的华语传承力度显著高于泰国其他地区。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族群文化认同驱动下，泰北“云南人”新生代学习、使用与传承汉语的积极性日益增强。加之其移居历史不足百年，华语传承基础较为稳固，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针对泰北特殊的语言生态，我国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可参考以下策略：

（一）强化文化认同：激活中华文化基因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导，通过激活泰北“云南人”的中华文化基因，系统性提升新生代华语传承效能。后结构主义理论视阈下的全球文化竞争，其本质是不同文明体系中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深层博弈。若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¹。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的传统价值体系，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源泉。尽管移居异国，这些文化

¹ 源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4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https://news.cri.cn/20161208/f6e81add-f418-6f97-2b98-4975bd398b4a.html>。

基因已深植于泰北“云南人”（尤其第一、二代移民）的精神认同中。国际中文教育机构应依托语言教学，唤醒其文化记忆，激发文化基因表达，使泰国本土新生代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持续认同中华传统价值。此举既可维系族群文化特质，亦能强化其作为中泰多领域交流的桥梁功能。

（二）适配语言生态：创新文化传播模式

立足泰北多语多文语言生态，采用受众导向的传播策略助力华语传承。语言作为“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与“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对个体发展及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关键作用。传承汉语汉字既是泰北“云南人”保持族群特质的根基，亦是其联结祖国的重要渠道。国际中文教育单位需遵循传播规律，针对当地语言使用特征，设计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文化传播体系。通过契合受众偏好的传播方式，有效促进汉语与中华文化在传承场景中的深度融入。

（三）拓展统战维度：凝聚同源少数民族群体

深化与泰北同源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联结，构筑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国际中文教育应贯彻我国巩固爱国统一战线的原则，不仅面向泰北汉族“云南人”，更需覆盖迁居泰北的少数民族群体（如苗族、阿卡族等）。通过系统讲述中国发展故事，增强其对祖国的情感，服务于新时代统战工作、地缘安全维护及“一带一路”南向推进的战略目标。具体可采取建立跨境线上文化交流平台，开发同源民族文化资源库，提供专项“寻根留学”机会等。此类举措将有效提升少数民族群体对中华语言文化的认同，强化其作为爱国统一战线有机组成部分的归属感。

六、结语

构建完善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在此进程中，同根同源的海外中华儿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提升其在汉语汉字及中华文化方面的素养，不仅有助于其更好地传承族群的语言文化符号、维系族群特性，更能深化其对祖国——中国的认知与认同，从而有效发挥其在中外交流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以由中国云南移居泰国北部的“云南人”群体为例，其对祖国仍保持着较强的文化认同，汉语及中华文化传播状况相对良好，为在当地开展汉语及中华文化传播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然而，需关注的是，受泰北地区多语多文的语言生态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多重因素的复合影响，该群体虽在泰国境内汉语文化传播表现相对突出，但其原有的单一汉语传承模式已被打破，呈现出显著的杂糅性特征。尤其自第四代起，逐渐显现出融入泰国主流社会的趋势。

针对这一现象，祖国中国的支持其汉语及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时，应秉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具体策略上，应立足于泰北独特的语言社会生态，以激活其内在文化基因为目标，采用符合当地“云南人”群体接受习惯与文化喜好的方式，助力其更有效地传承中国语言文化。此举旨在强化其文化认同与纽带，使其能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南向推进中，更充分地发挥连接中泰两国的关键桥梁作用。

Funding: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缅老泰三国毗邻地带海外侨胞对华向心力的表征及寻根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3BMZ161）”、国家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课题“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泰北‘云南人’华语传承调查及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2YH98C）”之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u Juanju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5396-1768>

Wang Jinjun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0327-3306>

References:

- Sara Beaudrie & Michael Fairclough (2012). Introduction: Spanish as a Heritage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 Beaudrie & M. Fairclough (Eds.), *Spanish as a Heritage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17.
- 曹贤文 (2014): “继承语理论视角下的海外华文教学再考察”, 《华文教学与研究》(4): 1-8.
- [Cao Xianwen. (2014). “Re-examining Overseas Chinese Teaching from Heritage Language Theor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 1-8.]
- 曹贤文 (2018): “传承语教育与海外汉语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第6版.
- [Cao Xianwen. (2018).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Overseas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7th, Sep, p6.]
- Xuesong Li Curdt-Christiansen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4), 351-375.
- 戴庆厦 (2017): “中国的语言传承工作能够为世界提供参考”, 《语言战略研究》(03): 1-6.
- [Dai Qingxia. (2017). “China’s Language Transmission Practices as Global Reference.” *Language Strategy Research* (3), 1-6.]
- 郭熙 (2015): “论汉语教学的三大分野”, 《中国语文》(05): 403-413.
- [Guo Xi. (2015). “On Three Domain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 403-413.]
- 郭熙 (2013): “华语传播和传承: 现状和困境”, 《世界华文教育》(01): 1-8.
- [Guo Xi. (2013). “Huayu Dissemination and Transmission: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World Chinese Education* (1), 1-8.]
- 郭熙 (2017): “论祖语与祖语传承”, 《语言战略研究》(03): 78-89.
- [Guo Xi. (2017). “On Ancestral Language and Its Transmission.” *Language Strategy Research* (3): 79-89.]
- 郭熙 (2020): “试论海外华语传承话语体系的构建”,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 13-20.
- [Guo Xi (2020). “Constructing Discourse Systems for Overseas Huayu Transmission.”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3-20.]
- 郭熙 (2021): “华语与华语传承研究再出发”, 《语言战略研究》(04): 45-54.
- [Guo Xi (2021). “Revisiting Huayu and Its Transmission Research.” *Language Strategy Research* (4): 45-54.]
- Jennifer Leeman (2015).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5): 100-119.
- 李宇明 (2003): “信息时代的中国语言问题”, 《语言文字应用》(01): 1-8.
- [Li Yuming (2003). “Language Issues in China’s Information Age.” *Applied Linguistics* (1): 1-8.]
- Shanshan Li (2020). “We Only Speak Chinese at Home: A Case Study of an Immigrant Chinese Family’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New Zealand”. *He Kupu* 6(3): 41-50.

- Ana Llombart-Huesca & Alberto Pulido (2017). "Who Needs Linguistics? Service-learning and Linguistics for Spanish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Hispania* 100(3), 348–360.
- Silvina Montrul (2006). "On the Bilingual Competence of Spanish Heritage Speakers: Syntax, Lexical-semantics and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0(1): 37–69.
- Silvina Montrul (2011). "Morphological Errors in Spanish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nd Heritage Speaker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3): 163–192.
- Guo-Ming Mu (2016). "Looking Chinese and Learning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The Role of Habitus."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15(4): 293–305.
- Maria Polinsky (1995). "Cross-linguistic Parallels in Language Loss."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4(1–2): 87–123.
- Guadalupe Valdés (2005). "Bilingualism,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and SLA Research: Opportunities Lost or Seized?"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9(3):410–426.
- Xiaoming Xiang (2016).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at the Post-secondary Level". In J. Ruan, J. Zhang, & C. W. Leland (Ed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pringer:145–164.
- Ying Xie (2014). "L2 Self of Beginning-level Heritage and Non-heritage Post-secondary Learners of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47(2):189–203.
- 王爱平 (2006): "汉语言使用与华人身份认同——对 400 余名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109–113。
- [Wang Aiping (2006). "Chinese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ty: Survey of 400 Indonesian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109–113.]
- Jian Zhang (2010). "Parental Attitudes Toward Mandarin Maintenance in Arizona: The Examination of a Group of Immigra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ritical Inquiry in Language Studies* 7(4): 237–269.
- 张金桥 (2021): 《华语传承、认同及测试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 [Zhang Jinqiao (2021). *Huayu Transmission, Identity and Assessment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周明朗 (2014): "语言认同与华语传承语教育", 《华文教学与研究》(01):1–8。
- [Zhou Minglang (2014). "Language Identity and Heritage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1–8.]